

从公民文化到价值观变迁 ——西方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经验

汪卫华

内容提要 自阿尔蒙德与维巴有关“公民文化”的经典研究以来,西方政治文化领域的实证研究始终处于将政治现代化等同为民主化的基本研究预设支配下,围绕“何种政治文化有助于民主制度的稳定”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在意识形态之争终结、“第三波民主化”的大背景下,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进步,通过修改关键概念和改进操作方法,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出现了新一轮的繁荣局面,其中围绕社会信任对民主的支持作用展开的“社会资本”和“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风行一时。本文通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文化实证研究领域不同研究议程和理论模式的梳理考察,试图展现这一研究领域内在的局限,并解释其为何难以出现“范式转移”型的科学革命。

关键词 政治文化 公民文化 价值观变迁 社会资本 研究议程 范式

政治文化研究是历久弥新的大课题。因其带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很难坚守

* 汪卫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083)

无论古希腊哲学家对人性与政体关系的讨论,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黑格尔等对“民族精神”的阐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民情”的重视,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人类学家对民族性、文化类型、生活方式的研究,以及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对意识形态的持续关注,都从不同角度探索了文化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勃林特(Brint, 1991)把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追溯到三个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研究传统,二是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三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中形成的对政治文化的“科学”或者“行为功能”研究方法。

“价值中立”,故此类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时常受到质疑。与政治哲学研究不同,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则的政治文化研究者不满足于对“应然”的规范性讨论,而试图不断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汲取灵感,进行经验探索与实证研究,以期从丰富的社会事实中梳理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变迁、政体演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规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政治学者在梅里安(Merriam, 1931)主持下进行的公民训练(the Civic Training)比较研究项目就开始了实证的比较政治社会化研究,其中既包含了后来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也为当今西方政治科学中的文化研究设定了基本思路——着重讨论何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可以支撑稳定的民主政体,并且以何种手段可以在特定社会中有意识地塑造其核心价值共识(Atmond, 1980, 199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官方深入了解苏联、东欧、亚太地区乃至非洲、拉美社会状况的需求日益迫切,在各种官方、半官方资源的有意引导和大力支持下,为数众多的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学者以广泛的文献资料结合深入的实地调查,采取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了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既往的研究范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文化研究文献(Benedict, 1934, 1946; Gorer, 1948, 1955; Mead, 1942, 1953)。另一方面,战后社会科学各领域系统论以及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推动了以认识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为目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方法交织互动为特征的跨学科研究议程(Powers, 2000)。可以说,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科际整合”的基础上,集中体现了跨学科综合的特性。

但是,随着比较政治领域的研究方法日渐“科学化”,上世纪60年代确立起来的“公民文化”范式(或“研究议程”)在把政治文化研究精致化的同时,也将其主要议题与研究话语收敛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阻碍了政治文化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本文将围绕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实证研究从“公民文化”到“价值观变迁”研究的演进历程,讨论“公民文化”研究议程于此间的“范式”意义,并反思其局限,尝试解释政治文化实证研究领域为什么迄今不能发生“范式转移”式的学科革命。

科学的本质在于其研究结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在政治科学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往往试图以文化因素来解释政治结果(政体类型、政治变迁、制度绩效等),但很多结论往往陷于循环论证或无关痛痒的指责(Jackman and Miller, 1996; Gendzel, 1997; Eckstein, 1988; Fommano, 2001; Seligson, 2002)。

本文所引参考文献除需另加补充说明者,均以“作者,发表时间(页码)”的正文插注方式标出,配合文后所列“参考文献”使用。补充说明与解释性注释则以页下脚注方式标出。

一、作为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基石的《公民文化》

初版于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鼎盛时期的《公民文化》(Almond and Verba, 1963)在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是公认的经典。它不仅以丰富的一手问卷调查资料和完整的理论建构开风气之先,同时也为比较政治领域主流的政治文化研究设定了“终极关怀”——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两位作者认定成熟的民主政治是保持现代社会长期稳定的政体基础,由此,“何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有助于实现稳固的民主秩序”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

在借鉴人格心理学对“知、情、意”划分的基础上,阿尔蒙德和维巴将文化化约为“针对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Almond and Verba, 1963: 14),以认知取向(cognitive orientation)、情感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和评价取向(evaluative orientation)三个层面加以界定。仿效韦伯“理想型”(Ideal Type)和帕森斯(Parsons and Shils, 1951)“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的方式,他们以个体的政治参与态度为中心,区分出村民/地域型政治文化(the 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the 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和参与型政治文化(the 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三种类型。基于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资料分析,他们提出一种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混合类型即“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公民文化的混合特性提供了得以支撑混合政府(the mixed-government)、保持权力平衡的社会基础,从而维护了民主政治的稳定(Almond, 1980)。

尽管在《公民文化》出版后不久,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在越战、学生运动、经济衰退及环保反核等“新社会运动”冲击下面临形形色色的“民主危机”(Crozier et al., 1975),阿尔蒙德和维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新现象的发展对公民文化造成了冲击,人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增强,政治效能感降低,但他们坚持自己的核心观点,即大众的不满是“对人不对事”的,并非对民主制度与程序产生根本的怀疑(Almond and Verba, 1980)。时至今日,尽管批评与质疑之声不绝,但《公民文化》所开创的研究风格及基本理论预设还是得到了政治文化研究主流的维护与认可,并且在非

1956年,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在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意义上界定了“政治文化”(Almond, 1956)。在英语文献中,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Webb and Webb, 1935)在他们研究共产主义的研究中更早使用了“political culture”这个说法。

西方世界影响深远。

近半个世纪之后,如果对照此后的政治演化进程和政治文化的研究文献,借鉴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Kuhn, 1996[1962]),大概可以归纳出《公民文化》在以下四方面之于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意义:

第一,政治文化研究被约束在“政治现代化”或“政治发展”的语境下。在《公民文化》出版前后,阿尔蒙德、维巴、科尔曼、白鲁恂及其他学者围绕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出版了一系列著作(Almond and Coleman, 1960; Pye and Verba, 1965; Almond and Powell, 1966),这使得比较政治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逐渐脱离了以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研究取向,逐渐忽略文明、文化与社会结构差异(Gendzel, 1997),在单纯的“现代化”视角下,从一维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来认识不同社会的政治文化。并且,这种二元对立思维逐渐影响到人文学领域。进而,将传统与专制落后、现代与民主进步简单等同,演变成为一种粗糙的价值判断。

第二,何种政治文化有助于民主的稳定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议题,甚至是单一议题。在冷战结束之前,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至少还有像对共产党政权及其他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广泛讨论(Brown and Gray, 1979; Pye, 1981, 1988),时有争鸣。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Inglehart, 1988)并没有在议题上拓宽,反而越发集中在对政治文化与民主化关系的讨论上。到底是公民文化巩固了民主,还是稳定的民主孕育了公民文化?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还是“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套套逻辑?(Muller and Seligson, 1994)阿尔蒙德等人的研究预设显然隐含了冷战时代“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当今浩浩荡荡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推动下,这种意识形态预设不仅未曾淡却,反而日趋强化。

第三,以加总的个体政治态度分布状况定义政治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把主要焦点放在主观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competence),换言之,只强调心理或感情的取向(Pateman in Almond and Verba, 1980: 67)。这样的操作化定义满足了测量需要,但“态度”到底反映出的是“应然”理想还是“实然”状态?在将政治文化通

中国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了阿尔蒙德、维巴、白鲁恂一系列有关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著作,并迅速在学界流行起来。尤其是1989年,《公民文化》在内地同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中译本(徐湘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马殿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同年出版了闵琦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这是应用《公民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内地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最早出现的政治学专著。中国内地理论界和知识分子对“公民文化”钟情至今,晚近的文献如何忠国、朱友粉:《公民文化:一种参与型复合政治文化》,《学习时报》2007年9月7日。而台湾地区学界则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在胡佛等人主持下应用这一方法展开了类似研究。

例如许多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尽管大多集中于描述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作品,与由民众政治态度问卷调查总结归纳的“村民型”、“臣民型”、“参与型”政治文化理想型大相径庭,但往往被不假思索地简单套用。

常理解为相对稳定的社会深层共有观念、信仰、价值、规范时,以测量多变的个体政治态度来反映政治文化到底有多大的效度(Validity)?显然,与社会心理学领域遇到的困境类似,但凡涉及“文化”研究议题,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面临以“表达出来的态度”反映,还是以“实际行为”界定更为准确的两难。

第四,微观层次对民众政治态度的问卷调查资料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阿尔蒙德与维巴开创的研究思路,得益于战后围绕选举研究展开的民意调查技术的成熟(Gendzel, 1997)。尽管今天的定量分析技巧大大超越了行为主义革命时代的研究水平,但西方政治科学主流在处理政治文化议题时,仍旧习惯主要以微观个体层次的问卷调查来反映宏观总体层次的政治文化。这样就难以回避研究方法上的“还原论”谬误:个体层次的资料如何能够有效地反映出社会结构层次的整体心态或者“文化”? (Lijphart in Almond and Verba, 1980)个体具有信念、价值观和态度,但没有“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现象。可以说,政治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相对沉寂,也与这种方法上的天然缺陷不无关联。

总之,在研究预设、核心议题、关键概念、操作方法四方面,《公民文化》开创的研究议程为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思路,大批政治学家投身其间,咸与维新,贡献了为数可观的研究成果。至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科学学科共同体范围内,确立了某种范式或研究纲领地位。

二、“公民文化”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

尽管《公民文化》确立的政治文化研究议程伴随“现代化理论”的传播风行一时,但正如作为某种“世界观”的“范式”按照库恩的说法会发生颠覆性的完形转换(Gestalt Switch)一样,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世界政治环境、尤其是冷战大局的变化,决定了这一“范式”迅速面临无法解释现实的大危机。

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是政治的“文化”或观念层面最具支配性的力量(Balhm, 1974),相形之下,以个体政治态度界定政治文化的

如果按照库恩的原意(Kuhn, 1996[1962]),一个成熟学科是以某个研究范式确立其“唯一的支配地位”作为这一学科成为“常规科学”标志的。如以此标准衡量,无论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迄今都没有类似牛顿经典力学或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的研究范式,还处于“前科学”阶段。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内,学者们对“范式”一词的过分热情,恐怕只能解释为大家看中了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或可译为“不可共量”, Incommensurability),适宜堂而皇之地掩饰不同学派、视角、思路之间的巨大分歧。在笔者看来,社会学与人文学领域很难说存在符合库恩原意的“范式转移”,而只有喋喋不休的理论争吵。如果实在要从科学哲学上找到本学科称其为科学研究的理据,更合适的支援恐怕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这一观念(Lakatos, 1978)。事实上,在政治科学领域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放弃“范式”的说法,采用“研究纲领”的表述或回归“思路”(Approach)的提法。例如沃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1986年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演讲就明确主张政治文化研究应成为重要的“研究纲领”(Wildavsky, 1987)。但在人文学领域,似乎多数学者还是对“范式”情有独钟。

“公民文化”研究议程可加运用的空间实为有限。我们只不过在接受所谓“价值中立”的实证、经验研究意义上,称其为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式”。

另一方面,正如前一部分所述,这一研究纲领有明显的意识形态预设,这套“科学的”民主理论旨在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扩散提供理据。但这一时期的现实政治环境对这一范式恰恰颇具嘲讽意味:西方民主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美国在越战的失败为标志,西方阵营在冷战中处于阶段性的弱势地位。相反,无论苏联的扩张,还是中国在“文革”困境中反而成功地在国际社会打开局面,都决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缺乏必要的吸引力。而在美国政治学界内部,亨廷顿明确提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并非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管治能力)的程度”(Huntington, 1968: 1)。这无异于学科内部的釜底抽薪,“公民文化”范式的研究预设与核心议题仿佛突然成了镜花水月,自然无从支撑政治文化研究这个巨大的空中花园。

所幸的是,政治文化研究在80年代中期就迎来了所谓“复兴”(Wilder, 1987; Inglehart, 1988),此后更持续红火起来。

首先,结构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的流行,尤其是在文化人类学中发展成熟的结构功能主义,引导后行为主义阶段的政治科学研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对不同社会结构的具体分析。尽管借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战后新兴学科发展出来的“政治体系”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引入了政治学研究,但它更像一个花哨的新标签,并没有为政治文化研究贡献更多的洞见。正如同样是政治学重要分支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莫顿·卡普兰在50年代(Kaplan, 1957)就将系统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但仅限于提出一套似是而非的国际体系分类法。只有到了70年代后期,肯尼斯·沃尔兹才在提出精致的“国际结构”概念基础上,让系统论思维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Waltz, 1979)。阿尔蒙德和维巴开创的政治文化研究议程过分依赖人格心理学的操作程式,忽视了社会结构对政治文化的支撑,更未能体现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普遍观念”的内涵。而要描述这种整体、宏观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的存在,就无法单纯依赖还原论思维,而必须发展带有“整体论”特性的关键概念和测量手段。

其次,历经20世纪60年代末遍及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社会运动的冲刷,从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逐渐恢复稳定。人口的代际更替、中产阶级日益壮大、社会福利政策普遍推行,这些变化引发了西方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静悄悄的

在阿尔蒙德与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中,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概念与其“体系、过程、政策”三个分析层次糅合在一起,赋予政治文化更广泛的内涵(Almond et al., 2008: Ch. 3)。在这个分析框架内,“公民文化”研究议程显然只是强调了“政治过程”这一层次。而体系层次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政府合法性”及政策层次的“政府角色、政府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等内容并未整合进去,也无法与《公民文化》中提出的“政治文化”定义相契合。

革命”(Inglehart, 1970, 1977)。丹尼尔·贝尔基于其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变化的敏锐把握,提出“后工业社会来临(Bell, 1973)。西方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既为政治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也为基于个体政治态度问卷调查式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以大规模集成电路LSI为主要功能部件的第四代计算机开始出现。1971年英特尔公司研制成功微处理器4004,微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的蓬勃发展,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应用新的统计分析手段处理大量调查数据提供了极大便利。研究对象的变化、资料的丰富、技术手段的进步,为延续阿尔蒙德等人开辟的既有实证研究议程提供了决定性条件。

再次,冷战时期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掩盖了探索政治现象文化解释的迫切性。由于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带有社会普遍观念色彩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对立是整体、宏观层次上的,构成了对微观、个体层次上“政治态度”的支配和补充。阿尔蒙德和维巴的政治文化研究从其狭窄的操作化定义出发,并没有整合进意识形态理论,但忽略意识形态这一维度,必然导致对个体政治态度形成、演变过程解释环节的丢失。研究者自身无法避免的意识形态偏好以及方法论上的矛盾,使得很难把意识形态恰当地整合进他们的政治文化理论。这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固有障碍,在所谓“政治文化复兴”之时,并非通过学科自身的进步加以解决,反而恰恰是拜两大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之间戏剧性的“休战”所赐。1989—1991年间因东欧剧变与苏联自身的崩溃,西方世界意外赢得冷战的胜利,大大增强了西方社会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自信。苏联模式的失败同时宣告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瓦解,兼之1974年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遍及全球(Huntington, 1991; Dahl, 1998),这不啻为西方政治科学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何种政治文化有助于稳定民主政体——注入了特效强心剂。

与一个社会文化传统塑型之艰难相比,比较政治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在不到十年间,因客观世界的政治剧变而顺势走出低谷。同时,由于它本身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特性,很容易从其他相关研究领域和学科的发展中援引助力,注定其自身不可能在研究预设、核心议题以及关键概念上做出更自觉的检讨与反思。

三、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层次困境

《公民文化》将个体政治态度作为研究对象。如前所述,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且缺乏足够好的统计分析手段的状况下,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采取了舍弃整体观念的做法。尽管从常识上可以说,公众的整体观念,即一个社会弥漫的某种心态或者特定社会大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观、知识,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文化”,但显然这样的文化概念是难以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加以呈现的。取而代之的整体概念大体分为三类:

其一,以意识形态 (B luhm, 1974)或宗教信仰 (Laitin, 1978)取而代之。正如前文所述,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主导的政治信仰,是可以轻易用来解释许多政治现象和政体差异的。但意识形态中包含大量“应然”理想,与实际政治行为相去甚远,既无法用以解释苏联行为的起源,也无法解释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现实,更不用说解释那些很难划分其意识形态归属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象。意识形态的讨论较之人文学更近,而较之社会科学要求甚远。宗教信仰更是如此。并且,宗教信仰分布与政治国家分布有天渊之别,根本无法用以解释那些在宗教信仰大体相同、而政治表现迥异的国家或地区的政体差异。更确切地说,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都是政治文化的来源之一,但并不能借以作为政治文化的操作性定义。

其二,以文化传统或文化遗产 (Pye, 1968; Lane and Ersson, 2002: Part 4)取而代之。在历史学语境中,讨论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往往可以通过梳理较长时期的历史文献加以反映。例如通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总结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传统、治国之术、御人之道,或通过历史文献分析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这样的研究当然有其学术意义,包括总结出某些“历史规律”,但此“政治文化传统”显然非彼“政治文化”,历史经验更非现实中的政治科学规律。

其三,以认同 (identity) (Calhoun, 1994; Kenny, 2004; Goff and Dunn, 2004)取而代之。对认同的形成或国民性等进行研究,是文化人类学始终在做的工作之一。个体对某一共同体、民族、国家等人类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决定其政治态度的重要基础观念。认同可以用来解释由于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产生的政治忠诚,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等研究议题,但个人对特定民族、国家的认同并不能用以解释其支持何种政体形式,对个体具体政治行为的解释力也极为有限。

如上可资替代的关键概念都无法承担起回答“何种政治文化有助于稳定民主政体”这一核心问题的任务。并且,就上述概念而言,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精英和大众之间存在明显的认识差距:无论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还是认同,只有在接受了相当程度教育的社会精英中才可能存在自觉的、相对明确的观念。至于宗教信仰,则在教派与教派之间、信众与无神论者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一句话,它们均对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影响,也可以成为政治社会化或政治动员的重要资源,却无法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操作性概念。

要解决研究层次的困境,一种思路是找到在社会整体层次上可以通过实证手段加以测量的、能够反映政治文化差异的核心概念;另一种办法就是找到较政治态度更为适宜的个体层次上的核心概念,通过适当的资料处理技巧和研究手段借以呈现社会整体层次的政治文化特征。同时,由于政治科学强调以可观察到的现象作为资料搜集对象,我们还必须小心辨别资料反映出来的是“实然状况”还是“应

然理想”——只有前者才可能作为推论的依据。

四、社会资本:整体层次上推进的思路

在当前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主流中,帕特南(Putnam, 1993, 2000)强调以社会及政治信任、公民共同体传统为核心内容的“(集体)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研究,是试图在社会整体层次上推进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代表。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Putnam, 1993)中,帕特南在研究设计与方法上有很大突破,他运用多元方法(或称之为三角交叉检视法[triangulation]),利用二十余年积累的一手问卷调查、访谈记录以及其他文献资料,以及“半形式理论模型,对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的绩效进行对比。他的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决定民主制度表现的重要因素。很明显,在证明“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一“铁律”上,帕特南的结论与阿尔蒙德等人的主张并无本质差别。

不过,帕特南没有坚持使用“公民文化”或者其他政治文化类型的划分,而选择了集体“社会资本”——普通人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往来互动中的互惠和信任规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概念。由此,他把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焦点由个体政治态度拉到了公民共同体中存在的互动行为和社会规范。在研究方法上,尽管帕特南利用了大量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但其用以测量“社会资本”的是结社行为与互动。这在《独自打保龄》(Putnam, 2000)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如此处理,就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政治文化研究无法脱离“应然理想”的指责,以行为和互动来呈现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中,特别强调了“社会信任”(这一部分则由个体态度的调查资料加以支持),反映出作者试图用一个精巧建构起来的普遍概念沟通个体与整体层次的努力(Laitin, 1995)。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之于社会健康发展与公民福祉关系极大。他试图以社会资本来解释民主的绩效,这就不仅是在回答“类型”的问题,而试图转向“善治”目标,提出一种关于民主表现“程度”的解释。这种接续“国家—市民社会”研究传统的理论努力,较之“公民文化”研究,解释逻辑更加丰富。但这也使得如何测量社会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成为其理论发展的核心环节。

帕特南(Putnam, 1993: 167, 171)将社会资本视为社会组织的特性,指那些能够通过更便利地协调行动来增进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与帕特南将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视为社会信任的主要资源不同,牛顿(Newton, 1999)则强调公共部门或第三部门如教育机构和大众媒体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资源,而“社会信任”或“个人信任”在资源上较之“政治信任”更多样化。

帕特南是在集体层次上使用“社会资本”的,来源于科尔曼(Coleman, 1990: 302)依据其功能(1. 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2. 在既定社会结构中便利个体行为)界定的社会资本概念。区别于社会学中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网络的学者着重讨论的个人社会资本(Lin, 2001)。

更重要的是,以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的关系取代公民文化与稳定民主的关系,深化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把讨论重点从政府(government)形式转向治理(governance)效果。在这一点上,福山对社会信任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Fukuyama, 1995)恰与帕特南的研究互为表里。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在“因变量”上的显著变化使这一研究议程可加以适当改造,在其他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下讨论社会资本对制度绩效的影响。可以说,核心议题的深化和关键概念的改变,是以“社会资本”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研究最突出的贡献。

但是,“社会资本”研究议程延续了“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分思路,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并非完全符合西方市民社会的模式,又当如何沿着这一思路讨论其政治文化对制度的影响呢?帕特南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五、价值观变迁:个体层次上的推进思路

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90, 1997; 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所搜集的数据(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95; Inglehart et al, 1998; Inglehart et al, 2004)展开的跨国政治文化比较和有关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延续了阿尔蒙德等人以个体层次资料来反映作为“特定社会中共享的态度、价值、知识”的文化状况这一研究传统。他强调“把人带回(经济发展、政治文化与民主的讨论中)来”(Inglehart, 1997: Ch 6),以价值观变迁带来的文化转型作为影响民主制度稳定的关键解释因素。

与《公民文化》不同的是,英格尔哈特没有重新归纳政治文化的不同类型,而是以更加细化的指标来具体测量个体价值观,再将这些数据归类,发现当今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变迁实际上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成就动机”)转变的程度;另一个是“后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自我表现价值”)转变的程度。据此,他论证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当今世界发达工业社会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渐出现了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趋势。这种变化在其方向上显著不同于自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化”,而以“后现代化”加以概括显得更为准确和恰当(Inglehart, 1977, 1990, 1997)。后现代化体现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英格尔哈特从社会目标、个人价值观念和权威系统等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之间,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之间的主要区别(表-1):

表-1 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

	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
首要社会目标	维持人的生存	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	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
个人价值观	传统的宗教价值或共同体规范	成就动机	后物质主义价值尤其是自我表现
权威系统	传统权威	理性—法律权威	不强调任何权威

资料来源:整理自 Inglehart, 1997: 75。

在后现代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将继续朝着现代化以来出现的“世俗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但在后现代化阶段,它们将表现出新的特点。就“个性化”而言,工业化以来宗教社会控制功能的弱化,为个人自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这一空间因日益增长的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与责任而被大量地挤压掉。在后现代化阶段,国家权威将削弱,“个人权利”优先于任何责任和义务。就世俗化及宗教信仰的变化而言,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当时的传统宗教被新教伦理取而代之,而后现代化则主要表现为现存的传统宗教进一步弱化,取而代之的将是人们对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的关切。人们会越来越关心自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不是作为手段的经济增长(Inglehart, 1977,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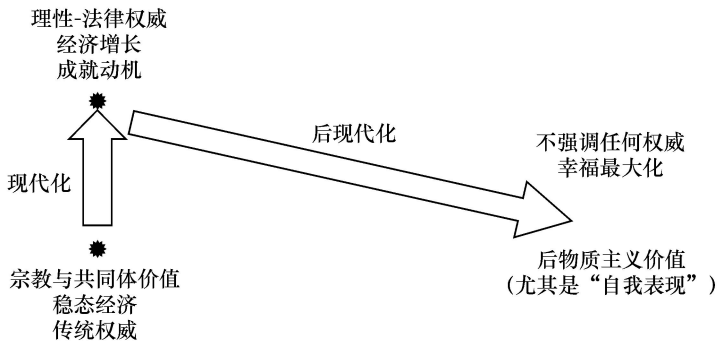


图-1 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

资料来源:引自 Inglehart, 1997: 75。

英格尔哈特研究的特色就在于他以个体层次价值观的变迁来解释社会层次(Societal-level)的变化,包括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经济发展。其整体解释思路是:经济发展既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又通过影响文化因素的转变导致稳定的民主。

在这一分析框架内,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共识的存在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吗?对这类问题的回答状况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程度,这是一个社会共有的文化观念,反映的是整体面貌而不是单纯的个体态度。而社会普遍信任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民主的巩固与稳定。通过这种从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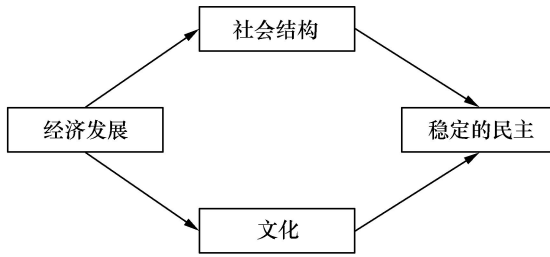


图-2 英格尔哈特有关文化变迁研究的解释路径

资料来源:引自 Inglehart, 1997: 184。

体态度到社会共有观念 (societal shared ideas)的巧妙转换,英格尔哈特在个体调查资料与民众的整体观念之间架起了桥梁,以大量数据表明个体层次后现代价值观的增长,支撑了社会的宽容、信任以及公民主动的政治参与,进而改善了民主制度的质量。可以说,英格尔哈特通过为普遍的社会信任提供清晰的个体价值观支持,重新发现了“公民文化”研究传统 (Inglehart, 1997; Wang, 2005: 32)。

并且,由于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将对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从共时性研究发展为历时性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文化因素解释政治变迁 (Eckstein, 1988) 仅依赖截面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存在的先天不足。至今为止已历四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可资对比的历史资料,这为运用更加精致的统计模型处理面板数据 (panel data),从而呈现各国近二十年间更加丰富的政治文化特性提供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处理“非民主国家个体价值观的变迁是否有助于民主化?”这类问题时,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较之“公民文化”传统展现出更大的自信。英格尔哈特与维尔泽尔给出了一个囊括社会经济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化的完整理论解释 (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 2):

大量的跨国调查数据显示:(1) 社会经济现代化,(2) 日趋强调“自我表现”价值的文化转型,以及(3) 民主化,都是一种单一的根本进程的组成部分:人类的发展。……人类发展的核心后果是人类选择与自治的扩展。随着现代化的这一面向变得越发突出,由此引发的文化变迁使民主成为合乎逻辑的制度结果。

显然,较之“社会资本”研究议程,“价值观变迁”明显接续了“公民文化”立足个体层次的研究传统。把关键概念由个体政治态度进一步“下沉”到基本价值层面,既绕开了对个体政治态度灵活多变、易受环境左右的质疑,又为把社会发展作为解释政治变迁的基本动力提供了一项关键的“中介变量”。尤其当有大量历时跨国调查资料作为支撑时,这种处理文化因素的研究思路显得更有说服力。

六、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中的概念争议与操作困境

尽管以价值观变迁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研究议程近十年间在政治科学领域日渐流行,而且“价值观”较之“政治文化”在内涵上显得更清楚,但基本概念上的争议仍然存在。尤其当把价值观调查资料拿来作跨国、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时,由于各种语言、文化背景下对价值、价值观的不同理解,问题设定的不匹配现象影响着推论的科学性。

受马斯洛需求层次学说的影响,英格尔哈特在民众“首要需求”的意义上界定 value。从这一定义出发,他以代际的价值变迁、价值冲突来解释不同社会对民主的理解差异及民主化目标上的差别。

以首要需求定义价值,显然可以有效地回避关于价值本质的争论 (Frondizi, 1971; Hutcheon, 1972; Rokeach, 1973),使之易于测量。由此定义,我们还可以根据需求的类型与程度为不同的价值进行归类 and 排序,从而形成“价值体系”(Allport et al., 1960; Bahm, 1993)。例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生命、爱情、自由是类型各不相同的价值,这首诗反映出诗人裴多菲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与主体的认同(identity)、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s or context)密切相关。脱离19世纪匈牙利独立运动的大背景以及裴多菲自身的民族认同,我们无从理解上面这首诗的内涵。同样,在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中,脱离主体认同和具体社会情境,单纯比较“首要需求”在不同社会中的分布状况,无论如何回避不了剪裁政治文化内涵的批评。

并且,在中文的使用习惯上,我们经常是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是非善恶含义上使用“价值观”这一说法。由于 Value 在中文中视语境不同,既可以译为价值,也可以译为价值观念。这样一来,在中文研究文献中,无论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心理学,往往都存在不顾自身语境的差异混用“价值”与“价值观”的情况,也很容易套用英格尔哈特等人的研究结论作为论证依据。

“价值观”与“价值”是否可以等同?在这一问题上中文表述似乎较之 value 与

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基于以下假设:一个人的基本需求观念形成于早年,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而且,一旦形成,这种观念在未来的各种生活变化中将维持长久不变。英格尔哈特从而认为,影响西方工业社会变迁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正改变着价值目标的相对短缺性,在结果上改变了西方民众的首要需求观念。老一代更注重传统的物质性社会目标,而西方新生代成长于这些目标已经相对实现的环境中,从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后物质性的目标上,如自我表达、个人自由、社会平等、自我实现、保持生活质量等等。由于不同世代之间价值取向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导致西方发达国家新公民运动的形成和壮大,进而质疑民主的基本原则,引发了代议民主与(直接)参与民主之间的争议。而在处于民主转型的东欧与东亚国家,外来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努力扩展,与这些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以及公众与精英人物对物质性社会目标的更多关注之间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冲突 (Inglehart, 1977, 1997)。

values更加准确。所谓价值观,顾名思义,也就是关于价值的观念,它至少包括对三个问题的回答:(1)何谓价值?有哪些价值?(2)如何评断价值高下?(3)如何实现价值?价值观以价值体系为基础,落实为价值判断标准,再与具体的社会情境相结合,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行为规范。理性个体的价值观一旦形成,相对稳定。它属于人们心中的深层信念(beliefs system),在人们的价值活动中发挥着行为导向、情感激发和评价标准的作用,构成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制约着个体行为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无形而有力的世界(Rokeach, 1973, 1979; Boudon, 2001)。而按照杨中芳(1994)的概括,社会价值观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体现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且通过家庭、教育、大众传播等社会化机制不断把这些观念灌输和传递给社会成员,最终使之内化为个体自身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由此,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才成为其文化的核心标志(Harrison et al, 2000),代表着社会对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什么的规范性判断,它相对于个体的价值观更加稳固、持久。因此,如果讨论价值观变迁,至少在中文的使用语境中,我们首先应该区分“价值”、“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意义上的“价值观”,其次还需要区分个体的价值体系、价值观与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价值观。

之所以要强调价值、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行为规范的差别,是因为价值现象是无法直接观察的,我们需要通过态度表达抑或具体行为来加以描述。这样就使价值观研究中“应然”还是“实然”的老大难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公民文化》中,由于把主要的测量对象设定为可通过问卷加以呈现的个体政治态度,这样就暂且回避了“这种态度是否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或价值观的反映?”之类的质疑。尽管我们可以说这种操作手段只能反映表面现象,但就其研究设计来说,测量效度并无问题。但如果我们试图描述的恰恰是价值体系或价值观的变迁,那么就需要仔细追问,表达出来的态度是否可以如实反映人们的价值观(Lane and Erron, 2002)?若把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相区别,无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还是个体价值取向(Kluckhohn, 1951),它们相对于评价标准都更为稳定。而评价标准则是在一定价值取向指导下,结合具体社会情境形成的。评价标准的变化既可能是价值体系或价值取向变化的结果,也可能是社会情境差异的结果,还可能是两者共同变化的结果。如何可以厘清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因素,就成为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技术来呈现价值观变迁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在价值观变迁的研究议程中,在操作定义上采纳“首要需求”界定 Value,由此测量出来的其实是前述价值观三个成分中的第一部分,并非“评价标准”或是非判断意义上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的主要操作手段是抽样问卷调查,尽管英格尔哈特在其研究中(Inglehart, 1997)反复强调社会层次的共有观念与个体政治态度的区别,但其数据来源仍旧需要着落在对个体价值取向的测量上,通过汇总个体价值取向来反映社会整体价值观样态。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技术了解某些观念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并可以在不同变量之间检验其相关关系,但这种分布状况就是我们试图把握的社会“共有观念”吗?尤其当我们把政治文化视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时,这种易于操作的价值定义无法胜任描述整体层次上那些在既定文化传统中显得“想当然”,但在其他文化传统中又完全不可理解观念。很多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符号(Lévi-Strauss, 1963),也很难在个体层次上加以呈现,这也是为什么比较政治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与国别政治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以及历史学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相互之间往往显得文不对题的主要原因(Gendzel, 1997)。

从深层次来说,正如前文中引述的英格尔哈特与维尔泽尔提出的从社会经济现代化到民主化的一套完整论证所示,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其实仍旧受到了启蒙时代以来关于“现代化与人类发展存在单一道路”的乐观主义信念的支配。尽管所预设的终极目标大相径庭,但这种信念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关于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理想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这种“一条路”的信念预设与人类学、历史学中更乐于接受的文化多元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这也决定了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与其接续的“公民文化”范式本身很难逃脱某种基本价值预设的束缚。

值得一提的是,沃尔达夫斯基在力促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处理共享价值观的研究思路。在沃尔达夫斯基看来(Wildavsky, 1987),政治偏好(political preferences)根植于文化——也就是“那些将社会实践合法化的共享价值观”——之中,偏好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endogenous),是来自于社会系统内部为了保护或反对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互动。当个人做某些重要决定时,这些选择同时也是文化的选择。不过,尽管沃尔达夫斯基的政治文化理论固然考虑到了共享价值观或信念在解释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一新文化理论的主要支援来自文化人类学(Douglas, 1982),很难加以实证测量。而且,他根据团体/网格(Group-Grid)品性来划分的静态的不同文化类型适合描述政治文化的差异,却很难用以解释文化倾向的变迁,也无法回答价值观变迁的动力问题(Thompson et al., 1990)。因此,尽管我们意识到在操作方法上,价值观变迁研究议程并不能恰当地处理跨文化比较议题,但在目前,英格尔哈特使用的方法与概念体系恐怕仍旧会继续占据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主流地位。

七、小 结

如果把帕特南的研究与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做一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社会信任是民主稳定的前提。所不同的是,英格尔哈特通过价值观变迁研究主要展现了社会信任的微观社会心理基础;而在帕特南看来,社会信任的来源更加多样化——他尤其强调公民共同体的结社传统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行为对于培养社会信任的积极影响。相对于阿尔蒙德和维巴注重“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文化研究,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展现所谓公民文化背后的社会与心理基础来构建自己的政治文化理论,并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更易于操作化的核心概念。

总之,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复兴其实是“意识形态终结”和操作方法改进的结果。更因为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本身就是跨学科性质的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喧闹与繁华的背后其实蕴含着研究预设与核心议题上的基本共识,对民主的信仰是支撑西方政治科学主流中政治文化实证研究不可动摇的底线。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无论英格尔哈特还是帕特南,在试图从文化层面理解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变迁时,都不可能比阿尔蒙德和维巴那一代政治文化研究者走得更远。

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可能存在范式转移型的“科学革命”吗?正如不修改第五公设,非欧几何就无从谈起;不推翻牛顿的时空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无以立足;如果不推翻《公民文化》以来在实证政治文化研究中隐含的研究预设,并提出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议题和关键概念,范式转移便无从谈起。如果将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视野继续局限在民主的稳定或民主制度的表现这一有限的范围内,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恐怕不会在“公民文化”传统以外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新贡献,而只会成为新开发的统计分析方法的试验场。要推进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跳出西方政治文化实证研究自《公民文化》以来形成的话语束缚和方法论困境,探索如何将社会整体层次的“文化、信念、价值、符号”因素透过适当的操作方法纳入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恐怕才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Abramson, Paul R. and Ronald Inglehart (1995), *Value Change in Global Perspectiv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lmond, Gabriel A. (1956),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8, No. 3, pp. 391—409.

——(1980),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Civic Culture Concept”,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p. 1—36

——(1983),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5, No. 2, pp. 127—138

——(1996), “The Civic Culture: Pre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ov. 17, 1996,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paper 96-01.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csd/96-01>, accessed March 18, 2008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1960),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1966),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G. Bingham Powell, Jr., Russell J. Dalton, and Kaare Strøm (2008),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5th ed.,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Sidney Verba, eds (1980),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Allport, G., P. Vernon and G. Lindzey (1960), *Study of Values*, 3r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Bahn, A. J. (1993), *Axiology: The Science of Values*,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B. V. Editions

Barry, Brian M. (1978),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Benedict, Ruth (1934), *Patterns of 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Bloom, William T. (1974),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Boudon, Raymond (2001), *The Origin of Values: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of Beliefs*,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Brint, Michael (1991), *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 Boulder: Westview

Brown, Archie, ed (1985),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tudies*, Amherst, N. Y.: M. E. Sharpe

——and Jack Gray, eds (1979),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ommunist States*,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Calhoun, Craig, ed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Cambridge, M. A.: Blackwell

- Crozier, Michel,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1975),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obert A.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Mary (1982), *In the Active Vo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Erikson, Robert S., John C. McIver, and Gerald C. Wright (1987),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3, pp. 797—814
- Eckstein, Harry (1988), "A 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3, pp. 789—804
- Fornisano, Ronald P. (2001),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1, No. 3, pp. 393—426
- Fronzizi, Risieri (1971), *What Is Value? An Introduction to Axiology*, 2nd e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Gendzel, Glen (1997), "Political Culture: Genealogy of a Concep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8, No. 2, pp. 225—250
- Goff, Patricia M., and Kevin C. Dunn (2004), *Identity and Global Politic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orer, Geoffrey (1948), *The American People: 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 New York: Norton
- (1955), *Exploring English Character*, New York: Criterion
- Harrison, Lawrence E.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2000),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Hutcheon, Pat D. (1972), "Value Theory: Toward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3, No. 2, pp. 172—187.
- 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3, pp. 1203—1230
-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Miguel Basáñez, and Alejandro Moreno (1998), *Human Values and Beliefs: A Cross—*

- cultural Sourcebook: Political, Religious, Sexual, and Economic Norms in 43 Societies: Findings from the 1990—1993 World Values Surve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et al, eds (2004), *Human Beliefs and Value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 Based on the 1999—2002 Values Surveys*, Mexico: Siglo XXI
- and Christian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kman, Robert W. and Ross A. Miller (1996), "A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3, pp. 632—659.
- Kaplan, Morton A.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Kenny, Michael (2004),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Dilemmas of Difference*, Cambridge, UK; Malden, M. A.: Polity Press
- Kluckhohn, C. K. M. (1951), "Value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An Explor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T. Parsons and E. A. Shils,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homa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st ed published in 1962 by the same press)
- Laitin, David D. (1978), "Relig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Weberian Tradition",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4, pp. 563—592
- (1995), "The Civic Culture at 3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1, pp. 168—173.
- Lane, Jan-Erik, and Svante Ersson (2002), *Culture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évi-Strauss, Claude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Vol. 1, trans Claire Jacobson), New York: Doubleday/Anchor Books
-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ad, Margaret (1942), *And Keep Your Power D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 New York: Morrow.
- (1953), "National Character", in Alfred L. Kroeber, ed., *Anthropology Today: An Encyclopedic Inven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rriam, Charles E. (1931), *The Making of Citizen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uller, Edward N. and Mitchell A. Seligson (1994), "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The Ques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3, pp. 635—652
- Parsons, Talcott, and Edward A. Shils, eds (195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wers, Wilko R. (2000), "The Harvard Study of Values: Mirror for Postwar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36, No. 1, pp. 15—29.
- Putnam, Robert D., with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Pye, Lucian W. (1968),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1),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 (1988),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and Sidney Verba, eds (1965),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keach, Milton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 , ed (1979), *Understanding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 Seligson, Mitchell A. (2002),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or the Renaissance of the Ecological Fall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3, pp. 273—292
- Thompson, Michael, Richard Ellis, and Aaron Wildavsky (1990), *Cultural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Wang, Zhengxu (2005), *Changing Social Valu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The Self-Expression Phenomenon and Citizen Politics in China and Five Confucian Societies: 1981—2001*, Ph. D. Dissert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Webb,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1935),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 Welch, Stephen (1993),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ildavsky, Aaron (1987),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1, pp. 3—21.
- 杨中芳 (1994), 《中国人真是集体主义的吗? ——试论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台北:桂冠图书公司。